红军战胜雪山的独特“法宝”

■李传祯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这首传唱至今的《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字字铿锵，句句滚烫，是红军长征翻越雪山那段艰苦岁月最生动的写照。90多年前，为尽快摆脱敌人、实现战略转移，红军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在长征途中翻越多座雪山，把敌人彻底甩在身后，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皑皑雪山高耸入云，雪山行军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行军阶段之一。红军官兵不仅要攀爬终年积雪、崎岖陡峭、泥泞路滑的冰山雪岭，还要面对高海拔山地的高原反应、高寒缺氧，有时还会遭遇席卷而来的狂风、暴雪、冰雹等极端恶劣天气，“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稍不留神就会跌入深沟。然而，从南方转战而来的红军官兵，却靠着独特“法宝”，在长征途中战胜了一座又一座人迹罕至的雪山。



红四方面军战士解富安爬雪山使用的脚马子。



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高秀英爬雪山所穿的防滑钉鞋。

充分的动员准备，是红军战胜雪山的物质基础。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后，来到了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大硗碛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以南，地处偏僻，气候寒冷。寨内的汉藏群众听到红军将至的消息，家家户户提前备好果品，兴高采烈地等候红军官兵的到来。6月11日中午，红军队伍出现在寨外，百姓立刻点燃鞭炮，敲锣打鼓地把他们迎进寨中。进寨后，红军指挥员当场严明纪律，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真心拥戴。在大硗碛，红军官兵遍访群众，细致询问夹金山的地形路况和上山注意事项。藏族青年莫日坚和汉族青年杨茂才等当地群众主动请缨担任进山向导，向红军官兵传授抵御风雪、避险求生的经验。藏民老乡反复叮嘱红军，要想安全翻山，务必选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赶在风雪相对平缓的时段尽快通过。

中革军委统筹制订翻山行动方案，面向全军深入开展动员。6月12日，红军专门召开动员大会，用英雄战史鼓劲加油，提出了“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等战斗口号，同时也强调“多穿衣、少停留、注意遮眼防雪盲”等注意事项。同日，红2师4团作为先头部队，率先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向夹金山进发。

在红军的大无畏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藏族群众纷纷给战士们送来青稞、土豆、兽皮、粮食、辣椒及自制的草鞋、登山杖和防寒被服，连夜赶制麻布护腿；不少老人拿出珍藏的羊皮接济伤病员，当地群众提前备好热食为队伍送行。红军指挥员根据向导的建议，组织战士们砍来竹竿、粗树枝做成拐杖，还集中采购了大量辣椒、大蒜、大葱，作为应急御寒食物。为防止雪地行军打滑，战士们有的把防滑器（俗称脚马子）绑在脚上，有的还给布鞋鞋底装上铁钉，大幅提升了行进的抓地力，提高了红军的前进速度，减少了因失足滑倒跌入雪山深渊的危险。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红军准备的物资算不上充足，但红军为翻越雪山进行的细致动员准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强大的组织能力，是红军战胜雪山的独特优势。翻越雪山虽然没有枪林弹雨的正面厮杀，却是一场对抗自然绝境的无声血战。在翻越夹金山期间，盘山而上的60里道路杳无人烟，要经过30道“之”字拐，一些山沟被常年的积雪覆盖，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大风时不时卷着积雪和冰块呼啸而过，吹到脸上如刀割一般，行至半程还有冰雹不时袭来。刺骨风雪割得战士们脸颊青紫开裂，稀薄的空气让人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红军队伍中大部分是南方人，从未经历过高寒缺氧的环境，翻越夹金山成为他们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关，也成为许多人记忆中最难的一段路。

面对步步危机的高海拔雪地行军，红军官兵始终保持并发扬了“信念坚定、团结友爱、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组织优势，展现出了“上下同欲者胜”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朱德上山时，主动将马匹让给伤病员，喝一碗辣椒水暖和一下身子，就拄着木棍、拉着战士们的手徒步启程。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年纪较大的干部天不亮就启程，冒着严寒相互扶持着艰难攀登。聂荣臻、左权、伍修权、邓颖超等伤病员则或拄拐，或坐担架，或拽着骡子尾巴一步步登山。

皑皑白雪中，红军官兵边开路边行进，前面的人用铁铲、刺刀在冰雪上挖出踏脚孔，后面的人则沿着他们蹬出的蜿蜒曲折的雪路往上爬。在“之”字形的行军途中，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为避免战友们掉队，大家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不少战士饱受冻伤、烂脚、伤病折磨，却始终坚守初心、绝不掉队。行进间不时响起红军跌入雪岩的惊喊声，喊声起处，立刻就有成群的战友用木棍、绑腿帮助掉进雪岩的同志往上拉。被救出来的人，很快拍打干净身上的雪块，稍作休整便又继续前进，风雪里断断续续的歌声，始终没有停下。队伍抵达最为凶险的五道拐垭口时，狂风裹挟冰雹肆虐，众人手拉手连成紧密的队列，循着浅浅的雪印稳步前行，以血肉之躯跨越天险，凭坚定信仰铺就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长征道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歌词中“千锤百炼不怕难”的誓言。

在第三次翻越夹金山的行军途中，红军遭遇罕见狂风暴雪，好多人背上的斗笠被狂风吹到半空，又落到几十丈深的雪沟里去了。为防止被旋风卷走，战士们五六个人自发地结成一个蘑菇形的人环，低着头，蹲在地上不动，等旋风过去再继续前进。一路上，大家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抵抗一阵又一阵的旋风。在这千年不化的雪山上，无数个蘑菇形的人环，像一朵朵迎着暴风雪傲然绽放的雪莲，闪耀着众志成城的光芒，彰显出集体力量的强大。

坚韧的战斗意志，是红军战胜雪山的精神支撑。三过夹金山的谢良同志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山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棵草，处处是高大的雪岩，峻峭的雪壁、深邃的雪壑，真是一片冰雪世界。山上本来没有路，但几万红军通过这里，已经踏出一条弯曲而宽阔的雪路。”

从山下出发时，还是酷热的夏季，红军衣着相对单薄。不到3个小时，就进入寒风刺骨的冰雪世界，大家冻得牙齿“咯咯”作响。有的红军战士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颤。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红军战士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昏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极端环境下，不断有战士因失温、高原反应永远长眠雪山，但是大家不退缩，不屈服，风雪里的歌声从未断绝，始终同雪山上的风暴英勇顽强地搏斗着。

翻越夹金山的途中，国民党的飞机受升限限制飞不到山顶，只能在半山腰来回盘旋。红军战士们抬头冲着盘旋的战机高声喊话：“来呀，有本事的来呀！”言语间满是从容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概。正是凭着这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红军官兵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顶住了风雪严寒、高原反应等重重生死考验，接连征服了一座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在千年不化的冰雪间留下了“红色英雄汉、飞步碎冰雪”的雄壮背影。

而翻越夹金山，也只是红军长征途中风雪跋涉的一个缩影。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红军攀越了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翻越雪山从来都是一场伴随着牺牲的苦战。在反复多次的翻山行军中，红军三大主力在雪山行军中的非战斗减员累计达上万人。雪山行军的路旁，时常能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那是为革命永远停下脚步的红军战士。幸存的将士们压下满心悲痛，没有丝毫消沉，他们接过战友留下的钢枪继续向前，把未竟的行军路一步步走下去。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知前路步步是险，却依然毅然迎难而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始终怀揣着为劳苦大众谋解放、让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崇高理想，始终抱有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追求。他们清楚地知道，翻越雪山是跳出敌军重兵合围的关键战略选择，哪怕前路满是艰难险阻、处处是生死考验，也始终奋勇向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的漫天风雪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里，但红军草鞋踏破冰雪铸就的精神永远不会褪色。红军官兵在雪山之上淬炼出的理想信念、无畏勇气、钢铁意志与团结合力，将始终照亮人民军队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向着胜利不断奋勇前行的方向。

一枚印章，见证长征铁纪

■莫复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在甘肃省迭部县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陈列着一枚苏维埃财政印章。这枚印章直径约10厘米，为圆形阳刻工艺，整体布局分为内外两圈。外圈以两颗五角星为间隔，环绕镌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字样；内圈以对称的麦穗、稻穗环绕地球图案，地球正中镌刻镰刀与锤头标识，完整呈现了红色政权的工农联盟属性。历经多年岁月沉淀，印章纹样至今仍清晰可辨，是长征时期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的重要实物见证。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跋涉走出松潘草地，抵达甘南迭部旺藏乡崔古仓。当时，部队已断粮多日，广大指战员全靠野菜、草根勉强支撑，体力消耗达到极限，连背枪行军都面临极大困难。就在这危急关头，红军先头部队发现了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管辖的崔古仓粮仓，仓内储存着小麦等各类粮食20多万斤。面对这足以让部队绝处逢生的补给物资，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没有一哄而上，始终牢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公平买卖、借用必留凭证”的纪律要求，第一时间将情况逐级上报。上级随即作出部署，指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林伯渠赶赴崔古仓，全权处理筹粮相关事宜。

红军进入迭部前，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散布谣言，污蔑红军“烧杀抢掠”。受其蛊惑，当地不少藏族群众携带物资躲进深山。此前，土司杨积庆虽接到国民党军阻击红军的电令，却早已看穿其借“剿红”吞并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杨积庆顶住压力，向部属下达密令：“不要堵击”“让其顺利通过”，并指示“派人设法暗中与红军取得联系，粮食不必坚壁清野，开仓避之”。按照这一部署，仓官巴保（即杨景华）安排手下“虚掩大门、打开内仓”，随后带领全部值守人员撤离，一同进入深山躲避。

巴保撤离后，特意安排妻子返回粮仓附近暗中察看动静，恰好与赶来处理筹粮事务的林伯渠相遇。林伯渠待人亲和细致，通过翻译与巴保的妻子平等协商借粮相关事宜。双方达成一致后，红军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对取用的粮食统一计量，按照人均约10斤的标准分配补给，所有取粮单位都将部队番号、取粮数量清晰登记在粮仓的门板之上。同时，红军专门筹措了银元和苏区纸币，当面交给巴保的妻子，总政治部还在仓板上写下告示，明确标注“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反复提醒全体官兵节约用粮、严守群众纪律。

为体现苏维埃政权的信用，林伯渠亲笔写下借据，明确标注所借小麦的具体数量以及折合的银元数额，郑重钤上这枚苏区财政印章，向对方承诺：凭此借据可向任何红军部队及苏维埃政府兑取相应银元，绝不推诿赖账。据史料记载，这枚印章最初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任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执掌，1933年8月林伯渠接任该职务后便随身携带。长征途中，林伯渠的随身“五件宝”——粮袋、草鞋、棍子、马灯和牛皮挎包广为人知。而这枚珍贵的财政印章，就一直妥善存放在他的牛皮挎包之中。

根据毛泽东同志“三天之内必须拿下腊子口”的命令，完成筹粮补给的红军主力立刻向腊子口方向疾速开进。巴保的妻子事后因害怕受到国民党当局和土司内部顽固势力的追责，便将这枚刚盖过借据的财政印章悄悄藏了起来。此后，林伯渠曾多次派人寻访这枚印章的下落，始终没有结果。实际上，这枚印章后来被巴保家人用结实的羊皮袋仔细包裹，藏进了屋梁的缝隙之中，从而得以保存。

局势平稳之后，躲进深山的藏族群众陆续返回家园。他们看到粮仓门板上一笔笔工整的取粮登记，又听巴保的妻子详细讲述了红军协商借粮、主动付款、郑重留下借据的经过，此前的疑虑彻底打消。不少群众主动站出来为红军传递路况信息、筹集御寒的皮毛和衣物，为后续红军顺利通过提供了诸多帮助。

20世纪80年代末，迭部县电尕镇麻古村村民安告翻修老屋时，在屋梁缝隙中发现了那个封存多年的羊皮小口袋。打开之后，这枚失踪半个多世纪的苏维埃财政印章重见天日。根据安告家人的口述，这枚印章是祖辈临终前郑重托付的遗物，几代人严守秘密，数十年来从未对外声张。后经文物部门和党史研究专家多方考证确认，这正是当年林伯渠在崔古仓使用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不只是当年红军借粮的历史凭证，更是苏维埃政权财政信用和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的铁证，承载着长征路上各族军民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线，严守群众纪律，既是当年红军赢得民心、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更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精神力量。

链接历史

八路军激战上下细腰涧

■沐宸孙杰

史说新语

1939年5月，日军纠集5000余人向山西五台台怀镇地区分进合击，进行大“扫荡”。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沉着部署，先组织陷入日军重兵包围的部队避敌锋芒、巧妙跳出合围圈，再以小股游击力量袭扰拖滞敌军，最终在繁峙上下细腰涧山谷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南北夹击，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

上下细腰涧战斗，是第359旅挺进敌后以来进行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有力粉碎了日军围歼我军主力的狂妄计划，进一步巩固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

避敌锋芒，跳出合围

1939年5月9日，五台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和繁峙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别从五台、豆村、繁峙、砂河、大营等地出动，企图分路合击驻在阜平以西龙泉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正在台怀镇以南地区休整的第359旅第717团。

敌人此次行动既诡秘又突然，从五台县城出动的一路日军当日便与驻守在台怀西南豆村的第717团侦察连前哨排接火。为避免在不利地形上与敌军主力硬拼消耗，团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第一时间将敌情上报旅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命令全团迅速转移。部队在10日拂晓前有序撤离豆村，向台怀镇南侧地势险峻的金岗岭机动。

部队刚抵达金岗岭，就接到旅部紧急电令：集结在繁峙的日军已向第717团侧后迂回偷袭，企图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将我军围歼于台怀谷地，命令第717团火速向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龙泉关方向靠拢。

从金岗岭到龙泉关全程百余里，原本有一条沿山沟直通石咀村的平坦大道。考虑到这条开阔大道极易遭到五台县城、耿镇方向出犯日军的侧击，部队当即放弃大路，选择翻越大岭直插龙泉关的崎岖山道行军。

部队开拔不久，就发现从五台经耿镇、石咀向北迂回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部队，已经抢先占领石咀和铜钱沟，彻底封堵住我军东进的通路。第717团多次组织突击力量强攻，试图撕开缺口打开突围通道，均因日军火力密集未能奏效。

此时，第717团的处境急转直下：不仅与旅部的电台联络完全中断，部队曾尝试从铜钱沟西侧向东北神堂堡方向转移，又遭到占领大底村的日军截击，突围行动再次受阻，全团彻底陷入四面被围的生死险境。危急关头，刘转连、晏福生带领营以上干部反复勘察周边地形，最终发现台怀镇与五台山东台之间，存在一处约六里宽的敌军防御空隙。经集体研究决定，趁日军合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从这处空隙穿插突围，反向挺进敌军后方，跳出日军的重兵合围陷阱。

当夜，部队在一名老樵夫引导下，经华坪、楼上村、西湾村、柏枝岩，连续翻越6座2000米以上的大山，黎明时分登上海拔3000余米的北台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拖敌于野，合力围歼

5月9日，从大营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部兵力，进至大寨口、神堂堡一带时，遭到八路军第359旅骑兵大队与旅教导营的节节阻击。当晚，敌军在后卫部队掩护下撤至口泉，次日占领盘道。12日，这路日军与其他几路实施合击任务的日军抵达台怀镇，才发现我军早已安全转移。眼见合围计划彻底落空，该部日军企图原路撤回大营，退至莲花岩、老坟台时，遭到教导营和第718团一个营的顽强抗击，只得放弃大路，改走山间小道仓皇逃窜。

旅长王震与几个团的指挥员研判敌情后，决定抓住这股日军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将其合围歼灭。他一面上报晋察冀军区，请第2军分区部队在五台、繁峙方向展开牵制，迟滞周边敌军增援行动；一面命令第718团、教导营和骑兵大队，在青羊口、神堂堡一带选定有利地形构筑阻击阵地，同时电令第717团由上娥河经车厂赶赴文溪参战，命第719团在大营、砂河以北区域牵制两地驻守日军，还要求所属部队广泛开展“麻雀战”，迷惑、消耗敌人。

不久，日军从盘道向青羊口、神堂堡方向开进，进入我军阻击地带。埋伏在各个山头的游击小组以冷枪四处袭扰，打得日军晕头转向、阵型大乱，只能在山沟里盲目打转。13日，日军向第718团和教导营防守的主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每次冲击都被我军坚决击退。日军深知沿大路回撤的难度极大，当夜便趁着夜色改向口泉、楼房底、吐楼方向逃窜，妄图经车厂、麻地坪的山间小路退回大营，却没料到成功突围的第717团已到达车厂。

王震及时觉察到日军改道西逃的动向，当即命令第718团主力与教导营沿大路两侧尾随追击，以第718团一个营和骑兵大队为右路，经王庄、文溪向上、下细腰涧迂回包抄，同时电令第717团从车厂向上下细腰涧发起攻击。

14日拂晓，第717团正准备出发，团直属分队发现从青羊口向北逃窜的日军前梯队400余人，正在上细腰涧集结休整。团长刘转连立刻传令各营迅速赶回指定位置投入战斗，命令团警卫连火速抢占那石梁东坡，趁敌不备集中火力发起猛攻。猝不及防的日军瞬间阵脚大乱，死伤惨重。等日军缓过神组织反扑时，该团各营已陆续赶到，在上细腰涧东西两侧高地全面展开部署，最终将日军前梯队全部歼灭。

日军后梯队500余人，逃窜途中先后在楼房底、吐楼子被歼灭一部，只能边打边退。得知前梯队陷入绝境后，这股日军迅速向北回撤，妄图协同前梯队打开北逃缺口。12时许，该部日军抵达下细腰涧附近，得知前梯队已被全歼，便就地依托地形负隅顽抗。此时我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赶来的部队先后抵达，将残余日军四面包围。当夜，这股日军大部被歼，剩余少数散兵躲入深山密林。15日上午，我军经过严密搜剿，将这股日军全部肃清。至此，从大营出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宫峙大队，除先期将部分伤员送回大营外，近千人全部被我军歼灭。此战共俘虏日军11人，缴获92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19挺、步马枪400余支、骡马73匹及大批其他军用物资。

在这次粉碎日军五路围攻的战斗中，第359旅全体指战员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连续7天6夜的作战中，既充分体现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也展现出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后受到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位于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神堂堡乡境内的上下细腰涧战斗遗址。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8525572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57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地址同社址）